

中国慈善研究丛书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向常水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慈善研究丛书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向常水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 向常水著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5

(中国慈善研究丛书 / 周秋光主编)

ISBN 978-7-01-015259-2

I . ①民… II . ①向… III . ①慈善事业 - 研究 - 湖南省 - 民国

②社会救济 - 研究 - 湖南省 - 民国 IV . ① D693.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551 号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MINGUO BEIJINGZHENG FU SHI QI HUNAN CISHA JIU JI SHI YE YAN JIU

丛书主编: 周秋光

丛书策划: 张秀平

作 者: 向常水

责任编辑: 关 宏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 晖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金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15259-2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自序

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历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史学是中国最古老的学科,所取得的大量成果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过往很长时间,我国历史研究重点在政治军事史、阶级斗争史等方面。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国外多样的史学思想传入我国,再加上我国社会越来越开放,学术研究环境越来越宽松,更何况,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很多问题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加以解决,这些变化都促使我国史学研究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其中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这是整体史观的一种应用,也是史学研究深入推进的例证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

作为社会史分支之一的慈善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且已取得许多研究成果。为什么慈善史会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呢?首先,慈善史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急待加强。例如,从理论方法上看,国内还没有出版专门的《慈善学》教程,对慈善的概念内涵、功能作用、社会定位等问题都还没有达成基本共识;从史料整理来看,出版的慈善史料集

还很不多见。其次,当前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又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因受到时代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规制,长期以来,社会并没有给予慈善应有的价值认同,更多时候鄙视其为“伪善”。只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人们才逐渐理性地对待历史上的慈善家、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 20 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大幅增强,社会变迁快速行进,公共事业在不断成长,人们关注慈善、参与慈善的热情日益高涨,从而使我国慈善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到底该如何发展,正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但最基本也是最保险的做法之一就是借鉴历史上慈善发展的经验。而且,把中国慈善史研究好,这本身就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研究慈善历史,挖掘慈善资源,宣扬慈善文化,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必须做好的工作。

在做慈善史研究时,必须先得对“慈善”有个认知、予以界定。就我的理解,首先,慈善行为不是义务,而是完全自愿的;其次,慈善主体是民间力量,政府主办的赈济救护属职责行为;再次,慈善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他人自我发展能力,而不是培养社会懒汉。最后,慈善与公益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慈善的受益者为特定困难人群,公益的受益者为所有民众。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慈善者,有恻隐之心者是也”。¹“简单说来,凡是牺牲自己的金钱、精神、气力去帮助别人都是慈善行为”。²可见,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大爱,是不图回报地帮助他人,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存在。

目前,我国学界慈善史研究较为活跃,成果不断涌现。从研究对象看,已经由过去只注重江南经济发达地区转为关注全国更多

有代表性的地域;从研究内容看,呈现多样化面貌,只不过主体依然集中在慈善组织研究、灾难救济研究等;从成果的形式看,也是多种多样,专著也陆续出版。更令人欣喜的是,综合性研究已逐渐多起来了。201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就把“中国慈善通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给予大力资助,这是我国慈善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之一。但是,绝不能就此认为个案研究已没有必要了。恰恰相反,由于我国慈善史研究起步晚,该领域的综合研究更需要大量的个案研究作基础,所以说,大量的个案实证研究依然是当前我国慈善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只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应更加注重理论视域的拓展和高度的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的现状和考虑,前些年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选定“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本书正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在选定这个论题时,以下几点理由说服了自己。

第一,区域社会史是深化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途径。慈善救济作为社会调控机制的重要内容,对于保持社会有序平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也是日常生活史研究关涉的内容。与社会史研究整体状况一样,我国慈善史的研究也必然经历一个宏观——微观——宏观、整体——局部——整体的过程。区域社会史研究,对于推进和丰富中国史研究大有裨益。

第二,目前关于民国时期慈善救济的研究尚属薄弱。民国社会史在这些年取得了许多有份量的成果,但论题主要集中在阶层和群体、社团、风俗、博彩、人力车等方面,慈善救济方面的比较少。我国学界对慈善救济的关注点主要放在民国之前特别是明清时期。赵清说:“从目前状况来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史研究还是薄弱环节,民国时期社会史的许

多重大问题没有进行研究。”³ 实际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灾乱频仍、国家无暇顾及民生,但社会秩序没有最终崩溃,这是与民间力量主导的慈善事业积极贡献分不开的。因此,更有必要对北京政府时期慈善救济事业进行研究,这有助于深化民国史研究。

第三,学界在区域慈善史研究方面对湖南、贵州等中西部地区较少关注。实际上,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是一个地方文化特色鲜明、政治生活特殊、相对自成体系的区域,在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湖南灾荒不断、政局动荡、军阀角逐,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这为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条件,再加上湖南地方经济落后,绅权发达,就使得湖南慈善救济更具地方特色。从一个侧面来看,加强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有助于深化湖南地方史研究。

第四,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还没有人做系统研究。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政局混乱,中央控制力衰微,湖南地方的自主特色比较鲜明(湖南当时的地方自治运动名闻全国);同时,灾乱叠至迫使慈善救济任务异常繁重,各地办理慈善救济的地方性特色鲜明。1928年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全国的统一,特别是1929年国民政府下令各省设立由政府控制的救济院以及各类政府掌控的临时救灾机构之后,慈善救济的地方特色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选取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有助于展现我国慈善事业多样化发展的特质。

时光飞逝,本人博士毕业已经快7年了,在这期间,书稿只是静静地平躺在书架上,但我心里总想着待有时间了,再收集些资料修改完善后找机会出版。周边的同事朋友则建议,如有出版机会,早点出版还是必要的,至少可以供同行批评之用。我觉得言之在理,但苦于经济拮据,出版的冲动依然难付诸行动。好在2014年

3月我从长沙理工大学调至湖南师范大学后,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国家重点学科非常支持我们教师的学术发展,爽快答应资助本书的出版。同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出版基金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正因为多方的支持帮助,才使本书得以出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秋光教授、李育民教授、曾桂林教授以及人民出版社张秀平编审的倾力帮助。

注 释

- 1 黄良铭:《劝慈善》,《扬善半月刊》1935年第45期,第7页。
- 2 张揆让:《慈善事业》,《复旦》1920年第8期,第64—66页。
- 3 赵清:《切近现实 重视近现代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民初社会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1)
第一节 动荡的时政格局	(2)
一、变动不居的政局	(2)
二、不容小觑的绅权	(6)
三、虎头蛇尾的自治运动	(9)
第二节 严重的兵灾匪患	(15)
一、残酷的兵灾	(16)
二、猖獗的匪患	(23)
第三节 绵延的自然灾害	(26)
一、民初湖南严重的自然灾害	(26)
二、北京政府时期湖南自然灾害的特点 及其原因	(35)
三、严重自然灾害对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影响	(38)
第四节 脆弱的经济态势	(40)
一、北京政府时期萧条的农业	(41)

二、北京政府时期脆弱的工商业	(44)
三、脆弱经济生态对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影响 ..	(49)
第二章 慈善救济机构的嬗变	(59)
第一节 传统慈善救济机构的历史演进	
(1915 年前)	(59)
一、慈幼敬老类慈善组织	(60)
二、励节类慈善组织	(69)
三、便民仓储类慈善组织	(71)
四、救生人道类慈善组织	(73)
五、综合类慈善组织	(76)
第二节 整合与规范:以省城慈善总公所和省区救济院	
为例	(79)
一、湖南省城慈善总公所	(80)
二、湖南省区救济院	(86)
三、私立慈善事业产款管理委员会	(103)
第三节 新型官赈组织的产生	(111)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官赈组织	(112)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官赈组织	(120)
第四节 义赈组织的出现	(124)
一、湖南义赈会	(124)
二、湖南华洋筹赈会	(130)
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	(142)
第三章 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	(151)
第一节 灾荒救济	(151)
一、兵灾的救济	(152)

二、水旱灾的救济	(165)
第二节 以工代赈和贷赈	(200)
一、以工代赈	(200)
二、贷赈	(214)
第三节 日常慈善活动	(217)
一、救贫	(218)
二、慈幼	(235)
三、积谷	(246)
四、恤嫠	(250)
五、消防	(253)
六、年米、劝善和惜字	(256)
七、施棺、义山和掩埋	(258)
第四节 红十字会事业	(260)
一、各地红十字组织的成立	(260)
二、战时救护活动	(264)
三、日常慈善行为	(268)
四、红十字会经费	(273)
五、社会对红十字的态度	(275)
 第四章 慈善救济的运行机制	 (287)
第一节 赈款筹集	(287)
一、向北京政府争款	(287)
二、索讨湖南公产	(297)
三、向省外广泛募捐	(306)
四、以义演等方式在省内筹款	(313)
五、发行彩票	(324)
六、省内特种捐	(328)

第二节 灾情调查	(330)
一、灾情调查的重要性	(331)
二、灾情调查的基本流程	(332)
三、灾情调查的基本项目	(339)
四、存在的主要弊病	(341)
第三节 赈灾款物发放	(344)
一、放赈的基本程序	(345)
二、放赈中的主要特点	(350)
三、放赈中的不足之处	(354)
四、赈粮采购和运输	(357)
第四节 结构类型和运转方式	(359)
一、内部结构的几种类型	(360)
二、慈善救济组织的分会	(362)
三、湖南华洋筹赈会干事会与评议会的角力	(364)
四、灾县驻外救济组织及其他救济组织	(371)
五、慈善救济组织间随机性合作	(377)
六、奖励制度	(378)
 第五章 慈善救济中几对重要关系	 (393)
第一节 熊希龄与湖南慈善救济	(393)
一、熊希龄是湖南慈善救济中的关键性人物	(394)
二、熊希龄积极倡导和参与筹募赈款	(397)
三、熊希龄热情参与筹款之外其他具体事务	(401)
四、熊希龄的慈善观念和主要思想	(403)
第二节 商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407)
一、商会直接组织或协助灾荒救济	(408)
二、商会参与筹捐赈款	(410)

三、商会吁请和平	(415)
四、对商会参与慈善救济的基本评价	(417)
第三节 省政府、省议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419)
一、省政府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419)
二、省议会在慈善救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424)
三、省政府、省议会在慈善救济中的互动	(427)
第四节 教会与湖南慈善救济	(429)
一、教会参与慈善救济的主要内容	(430)
二、教会参与慈善救济事业的特点	(435)
三、教会参与慈善救济的社会影响	(438)
第五节 长沙《大公报》与湖南慈善救济	(440)
一、长沙《大公报》在民国时期湖南舆论界的 重要地位	(440)
二、长沙《大公报》参与慈善救济的方式	(442)
三、长沙《大公报》关于慈善救济的主要主张	(443)
结 语	(457)
一、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特点	(458)
二、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贡献	(467)
三、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主要缺憾	(472)
四、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当代启示	(477)

第一章

民初社会与湖南的慈善救济

近代湖南自甲午战后面貌剧变,思想维新,工商经济变得活跃,民主政治呼声增强。民国肇始,湖南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土壤,在日后纷扰的时局中处于“磨心”的位置,再加上各种灾荒接踵而至,导致社会对慈善救济的需求突增。但湘省政府忙于军政事务,根本无暇注目社会民生。张敬尧在致北京中央政府的电文中明言他“才干重任,整理军事,民事实已时虞陨越,断无余力兼任荒政”¹,这使得慈善救济的重任落在民间力量的身上。可是,由于湖南工商经济无法与江浙等省区媲美,公共空间很不发达。当然并不能说全无,毕竟湖南因湘军勃兴造就了大批绅士,绅权很大,深刻影响了社会公共生活。可以说,北京政府时期湖南动荡的时政格局、严重的兵灾匪患、绵延不绝的自然灾害以及脆弱的近代经济等多种因素叠加,共同决定了必须有新型的慈善救济机制来适应社会需求,同时型塑了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的诸多特点。为更好地了解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的生态,很有必要先探讨当时湖南的社会面貌。

第一节 动荡的时政格局

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政局中有三个突出现象值得注意,即政局极度不稳、绅权势力很大、地方自治运动跌宕起伏。它们彼此交错作用共同造成了北京政府时期湖南迷幻的政局,这种结果对慈善救济的影响很大。

一、变动不居的政局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实际上控制了政权。但临时政府成立后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抵制,革命党内部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提议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于是开始了“南北议和”。2月9日,确定了对清室的“优待条件”8条,逼清宫退位。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1913年4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击败,是年11月,袁下令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撤销各省议会;1914年2月,修改“临时约法”,实行专制。1915年12月12日宣布称帝,改为洪宪。滇、黔、粤、桂、川、湘、浙等省反对,先后宣布独立,开始了护国运动,讨伐北洋政权。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亡故,复辟丑剧结束,但很快开始了所谓的“府院之争”,全国陷入了漫长的军阀混战之中。孙中山等革命力量依然在为理想不断抗争,但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的结局是悲惨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²。直到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

帜”，中国才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

民初全国混乱的政局在湖南同样得到充分反映。湖南地处要冲，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政局动荡不宁。1911年10月22日，长沙新军起义，宣告湖南“光复”，但不到10天时间，枪声再次响起，时任都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惨遭杀害，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议长谭延闿夺取都督宝座。谭在任期间，推行所谓“开明专政”统治，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经文化，革除陋习，惩治不法官吏。谭的这些举动给湖南带来了新风气。但“开明专政”是贤人加强者的政治，谭是贤者，但非强者，所以他必须仰赖革命派的支持。“二次革命”后，在革命派的逼迫下，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不久，革命失败，谭也只得“戴罪晋京”，“开明专政”也随之结束。接下来是汤芑铭在湖南长达3年的黑暗执政。1913年10月上旬，汤芑铭以“湖南查办使”名义进驻长沙，18日，被袁世凯正式任命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汤芑铭在湘期间，残酷镇压革命力量，搜刮民脂民膏，摧残经济和文教，博得了“汤屠夫”、“袁世凯手下的头号刽子手”等称号。1916年6月30日，程潜发布“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芑铭罪状”指出：“汤芑铭窃踞湘政迄今三年，罪恶满盈，全湘痛憾。”文中细数了汤芑铭的十大罪状“一曰吞没巨款，紊乱财政”；“二曰惨杀无辜，力长元恶”；“三曰畜植游探，流毒社会”；“四曰纵恃北军，蹂躏人民”；“五曰摧残教育，毒戢士林”；“六曰酷用毒刑，灭绝人道”；“七曰滥用私人，秽乱吏治”；“八曰盗卖矿产，次第卷逃”；“九曰出入警蹕，阻绝交通”；“十曰援结败类，败坏风俗”。³黄一欧后来也回忆说：“汤芑铭祸湘三年，密探广布，家家不安，人人自危。”⁴护国运动和各地反袁独立斗争深入发展使汤芑铭在湖南的统治终结了。7月5日，汤电请刘人熙及参议会议长陶思曾（陶澍曾孙）入都督府，宣布交出军民两政职权，随即仓促出

城,逃离湖南。

7月19日,北京政府任命刘人熙暂时代理湖南督军兼省长。8月4日,正式发布命令,特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的消息传来,湖南一度宣布戒严。段祺瑞利用张勋的丑陋表演巩固自己权位,派傅良佐督军湖南。谭延闿反对北洋军阀入踞湖南,并安排刘建藩、林修梅掌控驻湘南的湘军。此后,刘、林二人率军在衡阳、永州闹独立,对抗北洋势力;同时,谭浩明的桂系军队进入湖南,使军事斗争局面更加复杂。到1918年6月,北洋军队获得了战争中的主动权。

1918年8月,皖系军阀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但他与驻湘直系吴佩孚之间俨同敌国,对其他北洋军队无权过问,自身的兵力局限在岳州、长沙、宝庆一带。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地位是靠武力争来的,缺乏合法性依据,为了巩固地盘,采用各种残暴手段。张敬尧在湘3年所犯下的罪恶绝不亚于汤芑铭。其残暴统治主要体现在:其一,纵兵扰民。驻省城长沙的军队在张敬尧纵容下,采取压卖强赊、侵伤商人、强占商肆、强索赔偿等多种手段,诈取民财。其二,植党营私,拉拢省内某些社团。其三,摧残教育。张下令军队入驻长沙各中小学,挪减教育经费。其四,大肆搜刮。借口整顿金融,开办裕湘银行;强制推销“惠民”彩券;盗卖湖田;滥发纸币,以纸币折银洋攫取赈灾款。张敬尧在统治湖南期间,总计搜括民财多达2000余万元。⁵漫长的南北军阀拉锯战几乎蔓延湖南全省,以致遍地疮痍、民生疾苦,其中尤以醴陵、宝庆、株洲、岳阳等地为最。

1920年上半年,湖南各界发起了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张敬尧狼狈离开湖南,随之谭延闿第三度督湘,并在当时自治思潮的影响下,开展“地方自治运动”。其间,湘军内部出现内讧,赵恒惕在斗争中胜出,在湖南开始了军阀混战中难得的长达6年的执政权。